

缘何法律经常“打白条”

本报记者 林衍 崔丽

“由于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限制,在个案中又能够‘一步到位’解决问题,信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首选,本该是终极裁决的法律反而尴尬了。”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施杰对记者说。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施杰的一份关于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提案促成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他因此被评为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最近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一个更为广义的“司法权威”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出现上。

早在2010年3月27日召开的“首届两岸四地当地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机制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便曾指出,“信访不信法”不正常,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越快,信访群众越是“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甚至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全国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上,“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上访不信法”等句子

也在各代表团审议“两院”报告时被频繁使用。很多人人大代表都指出,信访是“人治重于法治”。

在施杰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正常又正常的”。

他说,所谓不正常,是因为法律本身意味着终极裁定,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也有救济渠道,可寻求二审或者申诉。但“信访不信法”则意味着法律的权威性受损。施杰随后强调,在现实环境下,“信访不信法”现象的存在的确有着现实合理性。比如,尽管有法定救济渠道,但是救济成本太高,门槛太高,包括申请再审或者抗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导致大家对案件有不服的时候,无法通过法律渠道得到妥善解决。这意味着,一场成功的诉讼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同时也可能付出相当大的成本。

据媒体报道,2009年河南南阳一农民工为讨回3.6万元的工资,打官司两年,先后找劳动仲裁委20多次,去法院60多次,为这场官司所花费的交通费就有4000元,住宿费2280元,用餐费9600元,电话费1000元,材料打印复印费200元。这场官司一共花费了1.7万多元,加上误工费,一共损失了5.3万多元。不仅没有讨回一分钱,反而还倒贴1万多元。

恰恰相反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往往将信访量纳入绩效考核,因此,如果选择走信访的途径,即使冒着问题久拖不决的风险,低成本的“诱惑”仍然让信访人心里存有一丝侥幸,“一旦到北京上访,就有可能得到有效处置,地方政府会花钱买平安”。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两院”工作报告时也曾建议,有必要通过完善诉讼法和公民信访的立法,实现“信访分离”。

齐奇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的发言中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当前法院工作的又一重大难题。终审不终,终而不结,反复交办,“信访不信法”等现象,日趋常态化。

据此,齐奇提出建议,一是完善诉讼立法,畅通再审渠道,强化司法终结效力;二是进行信访立法,将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当事人仍然提出种种案外利益诉求的信访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建议制定相关的《信访法》,规范包括涉诉信访在内的所有信访工作。

对于该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也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老百姓说‘信访不信法’,什么原因?当然有其他客观原因,但我想跟法官自身的公信力不够,权威不够是有关系的。”

施杰也有同感。据他观察,一些法官把法律当成了牟利的手段,导致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能否真正自律,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大家觉得把案件完全交给你处理,你能不能担当此任?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权力与关系往往对司法形成无孔不入的影响,‘这个案件考虑社会效果进行折中,下一个案件我的朋友来了也折中,再一个案件涉及到利益了也折中’”

施杰总结说,在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法官就处于很尴尬的状态,法律也处于纠结的状态。而信访就成了必然结果,“党委政府就会想,不管有理没理,都要给点安抚”。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到最后就变成了这样的滑稽局面。”施杰感叹道,“现在的尴尬状态是,法官必须达到法律、社会和政治三个效果的统一。”施杰说,“更可悲的是,一些法官先得讲政治效果,然后再讲政治效果,最后才讲法律效果。”



学习雷锋生前所在团先进事迹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李大勇 郭克鑫)今天上午,中宣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辽宁省委在北京联合举行学习沈阳军区雷锋生前所在团先进事迹座谈会,来自首都理论界和军队英模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和人生经历,畅谈学习雷锋生前所在团先进事迹的切身体会。

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军队新闻媒体报道了雷锋生前所在团50年坚持不懈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座谈会上,“当代雷锋”郭明义,“十大忠诚卫士”、武警某部连长谢光亮,全国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厉莉,“见义勇为战士”、现任济南军区某部政治部副主任的徐洪刚,北京市公交集团“李素丽服务热线”负责人李素丽,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张鹏,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晓红,国防大学教授方彬8名代

表先后发言。

与会者高度评价和赞扬了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先进事迹,称赞他们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的标杆。郭明义说:“雷锋团的战友们对雷锋精神的执着与坚守,让我感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向他们学习,像他们那样学习雷锋,像学习雷锋那样学习雷锋团。”中国优秀青年志愿者、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张鹏,结合自己9年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义务讲解员的经历,表达了自已对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景仰之情,他说:“雷锋精神应当融入到青年的生命和血液里,是新时期青年应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雷锋团官兵的实际行动,更加坚定了我这样的想法。”方彬教授说:“雷锋精神之所以在这个团50年经久不衰,关键是他们真正把握了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本质特征,把践行雷锋精神置于生活的沃土之中。”

今年前两月全国收缴非法出版物600余万件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记者刘声)记者从今天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1至2月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600余万件,查处各类案件1442起。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00%的副省级和地级城市(包括直辖市的区)、97%的县级市和县设立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今年以来,各地认真组织春节和全国两会前后出版物市场清理工作,扎实推进打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部署早、行动快,取得了初步成效。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查办案件已成为推动“扫黄打非”工作的重要抓手和衡量工作开展好坏的重要标准。今年将由单纯查缴非法出版物逐步向追查幕后主犯、向打团团伙窝点破网延伸,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大要案挂牌督办制度、办案补贴制度等一批管理制度,行政刑事有效衔接,推动案件快侦、快诉、快审、快结。对长期存在严重问题的地区,对因失职、渎职等造成严重后果的部门和公职人员,有关部门将严格追究责任。

广西桂平沉船事故共20人遇难

本报南宁3月27日电(记者谢洋)记者从今天从广西桂平市政府获悉,桂平市“3·11”水上交通事故搜寻工作已结束,据统计,确认生还30人(含两名船员),遇难20人。

3月11日13时25分,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石咀客渡035”号渡船违规严重超载(核载30人,实载50人),从桂平市城区四清渡口沿浔江下行驶往桂平市南木镇,当渡船行至白沙洲尾水域时,与梧州

市藤县沿浔江上行驶的桂平市锐丰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所属“锐丰329”号货船(核载1998吨,实载1900吨)发生碰撞,导致“石咀客渡035”船翻沉。

截至3月15日,确认事故生还30人(含两名船员),遇难14人,失踪6人。经过相关部门的继续搜寻,从3月19日19时起至3月25日上午止,又陆续从事发水域的下游河段打捞捞出6名失踪者的遗体。

深化合作 提高核安全水平

(上接1版)在华建立核安全示范中心工作进展顺利,该中心具备人员培训、技术研发、国际交流等多项职能,涵盖核安全、保障监督、核材料管制、实物保护等多个领域。中国建成了海关辐射探测培训中心,防范核材料走私能力不断提高。在高浓铀研究堆改造、放射源安全、人员培训、核出口管制等方面,中国同一些国家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中国确保大型公众活动核安全。近年来,中国承办了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多项重大国际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防范核恐怖活动,中国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开发使用新型核安全装备,加大对相关场所核探测和检查力度等。

——中国积极对外提供核安全及核能安全援助。中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多次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核安全培训班,为亚太地区10多个国家近百人提供培训。中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捐款,用于支持中国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核安全能力建设。中国倡导建立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机制,为提升本地区核能和核安全水平作出了贡献。

今后,中国将进一步采取核安全措施,确保本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深入参与相关国际合作,将着重做好以下工作。我们将加强核安全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排除安全隐患,提高整体核安全水平,履行有关国际公约,制定和完善配套法规体系,健全和优化核安全管理体系。我们将努力把本国的核安全示范中心建成技术交流和教育培训的地区中心,推动该中心同本地区其他示范中心开展合作互派,共同致力于提升本地区核安全水平。我们将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合作,全面深化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各领域合作,继续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捐款。我们将在做好本国高浓铀研究堆改造工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相关经验,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进行研究堆改造。我们将同各国分享中国在大中型活动核安全方面积累的经验,确保公众安全。

各位同事!

实现核能全面和平利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致力于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支持各国和平利用核能权利。实践证明,只有确保核安全,才能保障核能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化合作,努力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贡献。

各位同事!

(新华社首尔3月27日电)

湖北严查白鹿春公司骗补事件

(上接1版)湖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强调,项目需完善建设内容的,必须上报审批。

居家岭管理区和荆门市发改、经信部门之前上报给湖北省发改委的监管报告显示,白鹿春鹿系列保健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已完成进度的97%。然而,白鹿春公司董事长赵贵香表示,该项目计划投资2000多万元,目前只完成四五百万元的投资,“项目计划2010年完成”。

赵贵香承认,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违规问题,申报的项目所在地的确盖起了别墅,所以项目搬到养鹿场这边了,“只是挪了几百米”。而在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项目建在了武汉。

赵贵香解释称,之所以变更项目建设内容,在项目申报地点上建起别墅酒店,主要出于国家岭建设“中国农谷”的需

要。然而,记者了解到,白鹿春公司的别墅酒店于2010年开始建设,而“中国农谷”建设规划是于2011年9月开始编制的,目前还在编制过程中。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已与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郭洋表示,该项目调查结果出来后,将向社会公布。

欧晓平27日介绍说,白鹿春公司挪用国家财政补贴款的情况基本属实,具体的调查结果最近几天将向外界公布。

郭洋表示,情况查实后,将给予严肃处理,一定会依规收回补助资金,甚至对当地的项目申报实施一定的惩罚措施。他说,湖北省发改委欢迎舆论监督,此事暴露出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媒体监督有助于推动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

北京西城区: 暂不拆迁鲁迅故居

3月26日,游人从北京市西城区砖塔胡同84号院鲁迅故居前走过。

3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已决定暂不拆除鲁迅故居,并考虑依据历史照片进行原貌修复,其在所在的砖塔胡同也将同时得到完整保护。

砖塔胡同是北京最早的胡同之一,被称为“胡同之根”。本月初,位于胡同的84号院传出即将被拆的消息,引发舆论质疑。84号院是鲁迅居住过的院落,从1923年夏天到1924年5月,鲁迅在此创作了《祝福》等作品。

北京市西城区区长王少峰近日说,鲁迅故居在上世纪70年代已拆除并翻建,按照原有城市规划,该处原本计划建成绿地,但在听取各方建议后,“西城区政府决定暂时不拆除,并考虑按照原貌修复。”

晓晨/CFP



天津医学界追思南丁格尔奖章得主王桂英——

有这样的“南丁格尔”,何愁医患关系紧张?

本报天津3月27日电(记者张国)天津市医学界代表今天在天津中医药大学集会,为已故的南丁格尔奖章得主、新中国护理高等教育的开创者王桂英举办追思会。在这个场合,人们追忆的王桂英老人生前的小事,更令医学界深思。

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金钟带来几张王桂英生前的照片向人展示。他说,王桂英今年1月29日因病去世后,遗体捐给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献给了她为之奋斗终身的医学事业。捐献遗体志愿书是王桂英2009年病重时写下的——“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事业,为提高疾病防治水平,发展祖国医学教育,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张金钟说,王桂英先生走了,但她并没

有离开我们。她的遗体留在了天津中医药大学,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她所代表的南丁格尔精神正在并将永远在我们的工作中学习中发扬光大。

人们从一张“全家福”上读出了“王桂英先生的伟大”。她终身未婚,照片上的三口之家是“三姓之家”,是她收养了一名孤儿、赡养了一位老人后组建的。她的侄媳马汇民说,王老生前经常帮助别人,每都要接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姊妹到家里住几个月。人们对她的尊敬显而易见——在她晚年生病以后,到家里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10年都没有断过。

南丁格尔奖章得主、天津护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梅玉文说,如今国内常见的护理查房制度,就是在王桂英的倡导下开始

的。她于20世纪80年代创办了天津市第一届高级护理培训班,并开始推广护理查房工作,后来逐渐普及到了全国。梅玉文本人就是首届高级护理培训班的学员。在王桂英等几位前辈的推动下,天津医科大学还于1983年在全国率先恢复五年制本科高等护理教育专业。

天津市鹤童老年福利协会秘书长韩淑燕说,王桂英晚年成为鹤童养老院创始人之一。当时,她每次例行查房,全院179位老人,她都逐一走到床旁,挨个巡查,从不落下一个人。一次,一位患脑萎缩症的老人打翻了热水瓶,把同居一室的另一位老人烫伤,75岁的王桂英亲自制定护理方案,亲自给老人处理创面,亲自安抚老人和家属,亲自给老人制定营养康复食谱,

直至几个月后,老人转危为安。

梅玉文还记得,自己在1996年接到了王桂英打来的一个电话,那个声音令她“终生难忘”。当时,梅玉文因工作繁忙,多次推辞在天津市护理学会兼职,王桂英在电话里对她说:“我们都能为护理事业作奉献,你就不能吗?”梅玉文当时“无言以对”,从此警醒,“应该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梅玉文说,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的需求提高,这就需要更多的王桂英式的医护工作者。

在王桂英追思会现场,南丁格尔奖得主、天津市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陈荣秀向护理工作发出倡议:传承王桂英的优良品质,将人道、博爱、奉献的南丁格尔精神发扬光大,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素质修养,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建立关爱病人、关爱生命的职业情感,以慎独自律赢得患者的信任。

在追思会最后,天津中医药大学师生起立宣誓将忠诚于医学事业,竭诚致力于病人福祉。响亮有力的“南丁格尔誓词”回荡在会场上。

(上接1版)

她迅速从302医院抽调实验室专家赶赴现场,采集血清标本,进行病毒分类检测。经过3天3夜连续作战,工作人员最终确认这些学生是被肠埃希菌病毒感染。

陈菊梅准确的判断来自她在传染病领域多年的深厚研究。上世纪60年代,陈菊梅从国外研究中得到启发,大胆尝试利用感染病毒的细胞系变化来判断传染病病毒类型,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病毒类型的诊断准确率。

重型肝炎、肝衰竭一直是世界医学难题。“七五”期间,我国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高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作为一项重大课题交给了医院。每减低10%的病死率,就意味着每年让近万名慢性肝病病人活下来。陈菊梅目睹过很多家庭因肝病失去亲人。她提出:“我们力争把病死率降低20%到30%!”

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心就悬了起来。她能做到吗?

陈菊梅带领攻关协作组,深入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方法,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新新模式,确立了早期诊断、中西医辩证施治、用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方法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方案。

最终,这套方法使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下降到38%,降低了47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肝病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肝病病人的转氨酶居高不下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重要问题,陈菊梅一直在苦苦寻

找降酶药物。

她对低酶出院的病人进行过信件随访,可是发了200多封信,只收到4封回信。她又到地方医院请教,收获也不大。一天,一位先后7次住院的老人引起她的注意。老人告诉她,每次转氨酶波动都伴随睡眠不好,服用安眠药后才能入睡。

陈菊梅立即意识到,安眠药中可能含有降酶成分。她深入研究后发现,其中起到降酶作用的是中药五味子。经过多年探索,她将五味子原药烤干磨成粉,再加上茵陈、大枣、蜂蜜,做成蜜丸,并给它取了好听的名字“肝得安”。陈菊梅成为应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这一成果公布后,不少医院和科研所的同行前来请教,她都毫无保留地介绍。不久,某药物研究所和一家药厂根据她的研究成果,生产出一种新的降酶药物,获得了国际金奖。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陈菊梅却淡然地说:“我研究药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不管是谁生产出来的,只要对病人有好处,得不得奖、谁得奖,都不重要。”

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

302医院很多年轻医生都说,没有陈菊梅教授的引领,就没有他们个人的发展。

有一位医生,刚刚用大剂量赤芍治好两三位黄疸病人,陈菊梅就让他总结这几个病例,去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这位大夫有些犹豫。陈教授鼓励他说:“抛砖引玉嘛,出去听听也好。”

后来,年轻的医生在会上听了陈菊梅的建议,没想到,他的报告在大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这位医生就是后来以治疗重度黄疸肝炎而闻名的“全国百名老中医”汪承柏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年轻医生杨永平因为头脑灵活,善于协调,被某药厂看中准备“挖”走。陈菊梅觉得他是个当医生的好材料,征求了杨永平的意见后,她去找院领导,建议留住杨永平。

杨永平留在了临床一线。此后,他一直铭记着陈菊梅的话,“当医生就得弯下腰,一辈子做一名好医生”。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肝细胞体内移植术及多项肿瘤“绿色治疗”新技术,并首次在国内提出肝癌综合治疗模式,成功治疗3000多例肝癌患者。杨永平成长为国内肝癌治疗领域的知名专家。

陈菊梅常说:“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要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不良现象,多为年轻人成才创造条件。”302医院青少年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世殊是陈菊梅的学生之一。陈菊梅带着她完成了一个关于儿童肝衰竭治疗的研究课题,但申报奖项时,陈菊梅却主动删掉了自己的名字。

上交材料时,朱世殊又悄悄将老师的名字填上了。可获奖后,她不敢把证书交给陈菊梅,怕挨老师批评。于是,这本获奖证书一直躺在朱世殊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只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事”

陈菊梅是取得过很多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科研成果的专家,更是一名好医生。

1963年的一天,陈菊梅遇到一位被3家医院拒收的年轻病人,仔细检查后,她作出了“乙型肝炎后遗症”的准确判断。这是一